



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生活诗学

——读冯至《十四行集》

汪云霞

摘要：冯至《十四行集》的诞生有其特定的个人与历史境遇。1940年代，隐居昆明乡下躲避战乱的诗人得以与山水自然亲近，通过对自然的观看与冥想，诗人从平凡的境界和熟悉的事物中发现了日常生活“隐藏”的“陌生”和“深远”，由此体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十四行集》展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诗学境界。而40年代战争的大背景使诗人意识到其个人经验与时代、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民族的苦难与个体生命发生着深切的关联。因此，感时忧世的现实情怀总是若隐若现地渗透在《十四行集》的哲学沉思中。“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诗人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坚韧与自觉、自我决断的意识与担当的精神，也感受到一个民族觉醒和复兴的希望。

关键词：冯至；《十四行集》；日常生活；战争

早在1920年代，冯至就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①。而冯至在整个新诗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不仅在于“杰出的抒情”，还在于其抒情的衣裳所掩映着的充盈的哲思内核，他“以哲学做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②。读冯至的诗，我们像“感觉一朵玫瑰花的香味那样”^③感受到他的思想。从20年代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到40年代的《十四行集》再到50年代的《十年诗抄》以及80年代的《立斜阳集》，冯至诗风流变的轨迹被认为是“一部动人的四重奏”^④。而这流变中则又有着一以贯之的诗学精神，即以感性凝聚思想，以诗性叩问哲学，追求形象与思想、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正如钱钟书所言：“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象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⑤作为冯至代表作的《十四行集》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诗学精神，甚至被誉为诗化的哲学而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十四行集》给出了丰富的阐释，如它同歌德、里尔克思想的关系；它接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它渗透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等。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部诞生于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的诗歌作品，它究竟表达了诗人对世界、自我与时代怎样的哲学关照；诗人因何种境遇走向这一诗学境界；《十四行集》的表达方式属于诗人冯至独有，还是对特定生存状态下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示范性意义；在战争与诗歌、战争与知识分子等命题上，《十四行集》是否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思考维度。我们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分析。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

② 郑敏：《忆冯至吾师——重读〈十四行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

③ T. S. 艾略特：《玄学派诗人》，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④ 袁可嘉：《一部动人的四重奏——冯至诗风流变的轨迹》，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⑤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31页。

一、日常生活的诗性书写

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无不充满偶然,《十四行集》亦是如此。冯至曾这样谈及《十四行集》的创作契机:

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个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那时,我早已不惯于写诗了,——从1930年到1940年十年内我写的诗总计也不过十来首,——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这是诗集里的第八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因为我是那样久不曾写诗了^①。

就像里尔克创作《杜伊诺哀歌》时充满着神秘主义体验一样,搁笔10年之久的冯至,也突然遭遇新的诗情和灵感,仿佛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推动。冯至与里尔克、《十四行集》与《杜伊诺哀歌》之间的密切关联毋庸置疑。不过,阅读《十四行集》时,我们却感受不到里尔克作品那种浓郁的宗教氛围和神秘色彩。尽管两人创作之初都有相似的神秘体验,但在创作方式上,冯至却没有走向里尔克的超验和彼岸神灵世界,而是执著于日常生活经验和感性生命形式,在平凡的生活境界里,透过具体而微的事物去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尽管《十四行集》是一部充满哲理和智慧的诗,读来却让人感到亲切宁静、平和从容、沉着玄远。它没有艾略特“荒原”式的虚空与绝望;没有里尔克上帝般的拯救与启示;也没有歌德“浮士德”式的艰难求索;不是杜甫的慷慨悲凉、沉郁顿挫;不是卞之琳的“小处敏感,大处茫然”^②;也不是穆旦的自我分裂与灵魂冒险。冯至吸收了中西诗学的诸多养分,却凭自己的心性和修养将一切内化为无痕,由此呈现出自我独特的关照世界的方式,即在日常生活中体悟“道”。诗人所观之物、所感之人、所察之事,无不近在眼前,触手可及,合乎人情,关乎世态,为我们常人所了解和熟悉。而就在平凡生活的点滴处,在我们习见的事物和处境中,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豁然敞亮,获得圆满的实现。诗人由此窥见了“一个大的宇宙”,感受到了生命的“辽阔”与“旷远”,洞悉了“一切生的意义”。

《十四行集》共由27首诗组成。第1首也是诗集的首句“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③奠定了整个组诗的思想基点。“准备着”和“意想不到”既构成了语言的张力,也透露了冯至体认世界的方式。“奇迹”既“意想不到”又“准备着”而来,既超越生活又在生活之中。诗人并非外在于生活到超验世界去寻求宇宙人生的秘密,而是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原初状态,从可见的事物中去窥探生命的本质。第26首即组诗倒数第2首呼应并以总结的方式强化了诗歌开头所暗示的日常哲学: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回到我们居住的地方;/但是在这林里面还隐藏/许多小路,又深远,又生疏。”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恰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的诗意表达。“天天”日日,日积月累,我们在熟悉的生活中不断行进“准备着”,于是终有一天,我们得以窥见那“隐藏”在“熟悉”中的“深远”和“生疏”,“领受”到被日常的平庸所遮蔽的“奇迹”。《十四行集》处处凸显了这种日常生活的诗学境界。如从一只小昆虫想到它“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由此获得个体的价值以及繁衍种族的意义(第1首);从一棵秋日的树木想到生与死的蜕变(第2首);从高大的尤加利树看到神圣与肃穆(第3首);从路边的鼠曲草看到谦卑与尊严(第4首);从岛与岛的连接想到生命的关联(第5首);从一个村童或农妇的啼哭感到整个宇宙的悲苦(第6首),真可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诗人所描写的一切事物近在身边,其阐发的幽微深远的思想却又远在冥冥宇宙之中。而且,诗人面对宇宙人生、时代风云以及生命中的悲苦与喜悦,常以不卑不亢之态淡然处之,以宁静深远之心从容视之。如诗集的第10—14首,即使赞美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高这些人类精神和心灵的巨匠,诗人也没有过度张扬和放纵自己的感情,而是将自己对他们的理解、同情、崇敬和欣赏内敛为一种日常生活情态的书写,这种日常化的抒情方式

①冯至:《〈十四行集〉再版序》,载《中国新诗》1948年第3期。

②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载《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6页。

③冯至:《十四行集》,明日社1942年。本文所引冯至《十四行集》中的诗,皆出自该版本。

看似冲淡了情感，实则表现出更隽永悠长的意味，因为诗人在自我与抒情对象以及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生命体验相通的非个人化的抒情模式。

其实，“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也是冯至创作《十四行集》时的真实生活状态，正如他在序言里描述过的。写作《十四行集》的年代并非平静，而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40年代。冯至和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被迫撤退昆明躲避到乡下山野之中。诗人往日在喧嚣的都市里渴望回归自然的愿望竟在战争这样严酷的环境里得以实现。诗人说散步时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和想的也比往日的格外多。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冯至，在民族灾难深重之日，自然有种种现实的和精神的问题需要想得比平日多。另一方面，如同海德格尔回答“我为什么住在乡下”时曾说的，在乡下“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的原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①，冯至退避昆明过着乡野生活，确实有助于他更确凿接近事物的本身，透过自然感性生命而沉入哲学的本质。《十四行集》的创作灵感源于诗人散步时的看与想，而诗集呈现出来的哲学也可以说是“散步的哲学”，它具有散步的日常性和体验性特征。散步不同于疾走或奔跑，它没有目标的束缚，也没有时间的逼迫和身体的操劳，所以散步时精神相对超然和放松，能以无功利的审美的眼平静地打量周围的一切，体会到一些忙碌生活中不易觉察到的，从而逐渐接近事物的本质，抵达生命存在的本真。

冯至曾翻译了里尔克著名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其中对日常生活之于诗人的重要性有这样精辟的论述：“所以你要躲开那些普遍的题材，而归依于你自己日常生活呈现给你的事物；你描写你的悲哀与愿望，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用深幽、寂静、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用你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图影、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贫乏，你不要抱怨它；还是怨你自己吧，怨你还不够做一个诗人来呼唤生活的宝藏；因为对于创造者没有贫乏，也没有贫瘠不关痛痒的地方。”^②冯至一定程度上受到里尔克这一日常生活诗学观念的启发。朱自清在1943年就指出了《十四行集》表现日常生活境界的难得。他在讨论诗与哲学的关系时说：“也有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因为日常的境界太为人们所熟悉了，也太琐屑了，它们的意义容易被忽略过去；只有具着敏锐的手眼的诗人才能把捉得住这些。……我心里想着的是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③另一番评价似乎也适合冯至：“能以清明无邪的眼观察一切，能以无渣滓的心领会一切。大千世界的光色，皆以悦目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各样的音籁，皆以悦耳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④《十四行集》即以悦目的调子呈露了大千世界的光色，以悦耳的调子奏出了各种各样的音籁。李广田对此也高度评价：“诗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现象中，却不一定是在血与火里，泪与海里，或是爱与死亡里。那在平凡中发现了最深的东西的，是最好的诗人”^⑤。《十四行集》回避了40年代一些抗战诗“血与火”、“泪与海”的宏大抒情模式，而沉潜在富有生命体验色彩的日常生活境界里。《十四行集》所描写的，无论是眼前看到的还是记忆里想起的，似乎都平凡普通、司空见惯，但诗人从中却能体味到“最深的东西”。在“天天走着一条熟路”的日常情境里，诗人竟生发了这样令人警醒的哲学喟叹：“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第26首）

熟悉的东西并非必然是了解的东西。如同柏拉图谈论存在：“当你们用‘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⑥也如同奥古斯丁谈论时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⑦存在如此，时间如此，日常生活亦是如此。太阳底下最熟悉的事物可能正是最陌生的。常人看到的是熟悉和庸常，智者则企图发掘那被遮蔽的和隐藏的深远部分。所谓日常，也就是天天如此、日复一

①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②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载《冯至全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8～289页。

③朱自清：《诗与哲理》，载《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34页。

④沈从文：《论朱湘的诗》，载《文艺月刊》1931年第2卷第1号。

⑤李广田：《诗的艺术》，开明书店1943年。

⑥转引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2006年，第1页。

⑦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2页。

日、习以为常。这种日常性和重复性的特征,黑格尔称之为“日渐采取按照一般常规的机械方式”^①。韦伯称之为“铁笼”^②。而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生存的日常状态是一种被遮蔽状态,其主体乃是“常人”。“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常人的特征就是一种“庸庸碌碌”的“平均状态”。在这种平均状态中,常人排斥任何冒险和反常的东西。“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之事。……任何秘密都失去了它的力量。”所以,“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这几种方式组建着我们认之为‘公众意见’的东西。”“公众意见使一切都晦暗不明而又把如此掩蔽起来的东西硬当成众所周知东西与人人可以通达的东西。”^③如果说海德格尔以哲人的智慧深刻洞悉了日常生活的虚幻和陷阱,揭示现代人庸常麻木的生存状态的话,那么冯至则以诗人的敏感在熟悉的生活之途中看到了常人所没有看到的,想到了常人所没有想到的,也体验到了常人所没有体验到的。因而,他突破了常人“庸庸碌碌”的“平均状态”,突破了“公众意见”的“铁笼”,而对日常生活中凡是与其生命发生关联的事物凝神追问,沉思体察,从而成就了《十四行集》中那些现实而又永恒的智慧。

二、战争语境的存在之思

《十四行集》凸显和提升了日常生活的意义。然而,这“日常”既是日常又非日常,因为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基本而重要的事实,即1940年代的战争大背景。当整个民族处于血与火的灾难时刻,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切日常也无不笼罩在战争的巨大阴影之下。让我们再次引用诗人关于创作《十四行集》的一段论述:

这开端是偶然的,但是自己的内心里渐渐感到一个要求: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有时一天写出两三首,有时写出半首就搁浅了,过了一个长久的时间才能续成。这样一共写了二十七首^④。

“开端是偶然的”,但其实又有着某种内在必然性。因为战争这样“严肃的时辰”,必然促使诗人重新打量日常生活,重新思考个体生命的意义以及诗人何为哲学何为等问题。1935年9月,冯至从德国留学归来。回国的当天晚上,友人杨晦与他促膝长谈,当冯至谈到他未来的文学梦和学术梦时,杨晦严肃地对他说:“不要再做梦了,要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⑤。这番话给冯至强烈的震撼,他多次在文章里提及,即便半个世纪以后也还记忆犹新。不过,冯至真正看到了现实,却是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1937年8月,由于淞沪战争的爆发,冯至一家被迫南迁,直到1938年12月才抵达昆明,总算结束了困苦、惊恐、危险的逃难生活。在这一年多的逃难经历中,冯至目睹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自己内心也经历着复杂的蜕变。如果说此前,他受着“五四”以来鲁迅启蒙思想的影响以及里尔克存在主义哲学的熏染,更多感受到广大民众身上的不觉悟和个体存在的孤独虚无的话,那么此时,他从普通民众以及各种平凡的事物中,则更多体会到其执著、坚韧和向上的精神,由此感受到一个民族在战争中觉醒和成长的希望。他深刻意识到,在战争的大洪流中,个体与群体、自我与时代、生活与哲学不是孤立隔膜而是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正是战争使诗人体悟到日常生活的一切其实都“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

《十四行集》中“散步的哲学”也并非单纯的散步,在随时可能遭遇敌机轰炸而不得不跑防空洞的处

①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02~503页。

②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

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2006年,第147~148页。

④冯至:《〈十四行集〉再版序》。

⑤《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6页。

境中，诗人难以享受平常状态下闲庭漫步的轻松和愉悦，诗人也不可能把避难的生活当作道家隐世的逍遥之游，即使“天天走着一条熟路”散步时，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时代的郁结其实总是或深或浅地纠缠盘踞在诗人精神深处。《十四行集》中的第8首也是最早吟出来的那一首十四行诗即暗示了诗人在战争处境下精神的蜕变：

是一个旧日的梦想，/眼前的人世太复杂，/想依附着鹏鸟飞翔/去和宁静的星辰谈话。//
千年的梦像个老人/期待着最好的儿孙——/如今有人飞向星辰，/却忘不了人世的纷纭。//他们常常为了学习/怎样运行，怎样陨落，/好把星秩序排在人间，//便光一般投身空际。/如今那旧梦却化作/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

“旧日的梦想”应该指的是中国古文人的“鹏鸟”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识分子在乱世之中“兼济天下”不成，不免向道家寻求“鹏鸟飞翔”的逍遥避世之途。然而，在这里庄子的鹏鸟梦却是诗人即将要放弃的，它只是一个旧日的褪了色的梦想，在现实时空如“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毫无生命色彩。诗人肯定的则是现实中积极抗战的中国空军战士，他们才是无愧于古老民族的优秀儿孙，是他们驾驶着银色的“大鹏”英勇地保卫祖国，捍卫民族尊严。古代的旧梦已经向民族复兴的新梦转换，诗人的人生哲学中融入了对群体生命和民族境遇的关照。正如陈思和指出的，《十四行集》中第8首，“不仅仅是创作时间最早，其内容也是比较直接歌颂抗战的正面力量。但这一点以后被冯至所竭力淡化，也被评论家和研究者所竭力淡化。”^①实际上，当诗人试图赋予《十四行集》抽象复杂的哲理意蕴时，其感时忧世的现实情怀也总是若隐若现地渗透其中。

因此，阅读《十四行集》，或许还需要将它还原到现实语境即战争的大背景中。如果说最早写成的一首十四行直接涉及现实战争的话，那么排列在诗集中的第1首也隐含战争话语。它以昆虫的交媾和抵御危险来隐喻生命在瞬间成就永恒亦即“意想不到的奇迹”。“一次交媾”和“一次危险”暗示了生命的高峰体验，正是有了这样热烈而悲壮的体验，种族的生命才得以繁殖和延续。置于抗战中的个体生命不也如此？——在辉煌中毁灭，在涅槃中永生。因此，《十四行集》开篇就奠定了个体/群体、瞬间/永恒、生命/家国等多重复杂的意蕴。第2首以一系列的比喻：树木在秋日脱落了树叶和花朵、蝉蜕脱落了残壳以及歌曲的乐谱脱离了歌声等来回答“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从启蒙主义的立场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伟大的民族在战争中脱落它的杂质，冲刷它的积垢，剔除它的消极，通过这样艰难的蜕变而后获得新生。第3、4首以“萧萧的玉树”和“白茸茸的小草”来隐喻战争中那些庄严或谦卑的生命形象，或许正是它们维系着一个民族向上的力量。第5—7首表现了战争中的各种人生世相，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命运处境有深入思考。如第5首，大多数研究者注意到了其表达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念，如人的孤立存在状态以及交流沟通的渴望和障碍，但如果联系第6、7首来阅读，就会意识到其哲学主题中也渗透了现实关怀。如第7首“有同样的警醒/在我们的心头，/有同样的运命/在我们的肩头”以及“海水分成河水”的意象，应该指的是人们躲避空袭警报的场景，敌机、轰炸、炮火无时不在威胁每个人的安全，人们经历着同样的苦难，危险将每个个体联系在一起，而危险一旦过去，每个人又是独立的存在。由此对照第5首中“一个寂寞是一个岛”的意象，就可能意识到这是对个体与群体、生命与家国关系的形象化阐释。因此，第6首从眼前一个村童或一个农妇的啼哭过渡到观念中“一个绝望的宇宙”，这种从现实转入玄想的诗思方式很自然地将第5和第7两首连接起来。第9—14首，呈现了诗人在民族战争中的精神之旅。第9首写一个战士其实更像对一个英雄亡灵的祭奠。而第10到14首则转入与伟大灵魂的对话，他们是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和梵高。“选择这五位伟大文化亡灵作为讴歌的精神偶像，决不是冯至随意的安排，五个名字代表了诗人的精神历程上五个驿站，分别可以用五个词来命名：启蒙、战斗、困顿、转变、拯救，这是通过五个伟大人格的证明来完成的。”^②第15—20首，其间的战争

①陈思和：《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范之作：〈十四行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

②陈思和：《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范之作：〈十四行集〉》。

话语更加隐蔽。当诗人经历了精神的重要蜕变之后,必须要思考的是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问题。第15首用“驮马”和飞翔的“鸟”来表达对“实在”与“虚无”的感受。第16、17首都是从第15首引发出来的对生命的旷远性以及万物之间联系性的理解。第18和第19首似乎融进了爱情的主题。在苦闷的战争时刻,或许唯有对爱人的记忆才能抵抗生命的不安与孤寂。第20首再次呼应前面的生命互相关联的主题。第21—23首又从抽象的存在转入我们现实的处境。诗人用了一系列具体的意象,并且三首中有一个共同的意象“雨”：“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听着夜雨深沉”、“一天雨云忽然散开”,其突出的题旨是在狂风暴雨中坚守信仰、等待光明,也似乎暗合了诗人在抗战中的精神历程。诗人作为一个受难者的形象与现实中的一草一木共患难同分担。第24—27首,是整个诗集辽阔而悠远的尾声。对于战争中呈现出来的一切难以把握的东西:生与死、崇高与卑微、可知与未知、有限与永恒、个体与民族、现实与历史等,诗人希望以他创造的艺术形式来把握。在此用两个颇有创造性的意象“瓶”和“风旗”表达了这一艺术理想。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两个具有包容性和凝聚作用的意象也正是战争的象征符号。战争如同“瓶”和“风旗”一样,将一切泛滥的凝定,将一切分散的聚合,将一切遮蔽的凸显,将一切不可见的敞开,战争使我们更加迫切地思考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使我们更焦灼地寻求个体生命在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十四行集》中的哲学话语始终是和战争话语交织在一起的。或许可以这么说:“冯至的诗歌创作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抗战的现实,不过是他把里尔克的现代诗歌精神与中国抗战的现实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与当时的主流话语不一样的表达方式。”^①

实际上,我们通过分析《十四行集》的写作人称也可以发现诗人始终游离在两种话语之间。整部诗集复数性第一人称的抒情声音非常之多,从第1首“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到第27首“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我们”成为统摄许多诗行的核心称谓。如第2首“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第7首“我们来到郊外”;第15首“我们走过无数山水”;第16首“我们并立在高高的山巅”;第18首“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第21首“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第26首“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其实,诗中多处“我们”是完全可以被“我”替换而不会发生语义变化的,而且,“我们”所传达的也可能完全就是“我”个人的私密经验,但诗人却没有采用个性化的叙述方式,而是让“我们”替代“我”去分享诗人的秘密和世界的秘密。由此,诗人内在生命的隐秘体验被纳入到一种公开的集体性话语空间中,主体与他者之间对话的隐私性由此而丧失。不仅如此,《十四行集》中另外一种人称关系“你”与“我”的对话模式也表现出个人性话语与非个人性话语之间的张力。这种单数性人称的组合在27首诗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如第3—5首,9—14首,这些诗中一个隐含的“你”总是指向某种具体的形象。“你”可能是日常的平凡事物如尤加利树、鼠曲草,“你”也可能是诗人心中的圣者如鲁迅、蔡元培,而“我”与“你”对话时,往往只有“你”的默许、聆听、引导或“我”的恳求、倾慕、追随,并未形成谈话中的诸如疑问、诘难、辩解等对立或否定性因素,因而这一单数性人称的对话似乎也呈现出复数性合声的意味。总之,《十四行集》的叙事人称也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由此,“冯至的诗性自我中便呈现出一种微妙的交错对峙:生命与时代、个体与集体、对存在的冥想及对现实的关切。这使得诗人冯至始终飘移于个体与人群之间,在其强烈的内心独白式个体泛音中总能听出社会存在的沉重基音”^②。

三、自然万物的生命启示

冯至曾在散文集《山水》后记中说:“在抗战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质朴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了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

①陈思和:《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范之作:〈十四行集〉》。

②姜涛:《冯至、穆旦四十年代诗歌写作的人称分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是忍耐。”^①

1940年代，在“抗战最苦闷的岁月里”，当一些知识分子陷入精神的危机而感到困顿迷惘时，冯至却从各种自然之物那里获得慰藉和启示，领悟到“生长”和“忍耐”的意义。战争让此时的他对里尔克哲学有了新的发现，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山水自然的含义，意识到人与万物同存在共分享共同担当的命运。冯至《山水》中某些观点几乎是里尔克《论“山水”》的“中国化”和“现实化”。里尔克说：“人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他感到，它们的存在是怎样在规律中消隐，没有期待，没有急躁。并且在它们中间有动物静默地行走，同它们一样担负着日夜的轮替，都合乎规律。后来有人走入这个环境，作为牧童、作为农夫，或单纯作为一个形体从画的深处显现：那时一切矜夸都离开了他，而我们观看他，他要成为‘物’。”“人不再是在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孤单，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②“沉潜在万物的伟大静息中”，聆听它们默默生长的声音，观看它们谦卑执著的姿态，人自身的急躁、矜夸、骄纵、孤寂、虚空或许才可以被涤荡和剔除。人并非凌驾于物之上，而是与物共存于天地间，互相启发，相互敞亮。个体生命的存在，犹如一物置于万物之中，既无限孤单，而在最深处又相互关联彼此分享着共同的根须。如同海德格尔所谓的“在世界中存在”。这也就是说，“人这种存在者并不是像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的人’，是‘孤独个体’，而是总是处于世界之中，总是与世界上的事物和他人处于浑然一体的关系之中。”^③所以，“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④《十四行集》是建立在诗人对于自然万物的观察基础上的，它是一部“散步的哲学”，又是一本“自然的物语”。

冯至学会了像里尔克那样观物和咏物，但又剔除了里尔克诗中的某些超验色彩和虚无情绪，而吸收了其思想积极的一面。冯至说：“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对于草木鸟兽（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物）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这样，自然无所谓艰难，也无所谓孤单，只是隐瞒和欺骗。欺骗和隐瞒的工具，里尔克告诉我们说，是社会的习俗。人在遇见了艰难，遇见了恐怖，遇见了严重的事物而无法应付时，便会躲在习俗的下边去求它的庇护。它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却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担当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和我们的始祖担当过的一样，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⑤处于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是遭遇了“艰难”、“恐怖”和“严重的事物”，而此时里尔克哲学的重要警示即在于生存的自觉和担当的精神。因此，“在民族面临生死考验的年月，冯至尽量化解（里尔克）存在主义的阴郁色调而多热情的激情，是期望通过个人自觉达到民族的自觉与复兴。”^⑥当然，正如有研究者已指出的，除了里尔克的哲学，40年代的冯至也越来越认同于歌德的蜕变论思想和杜甫的感时忧国精神，尤其是后者，因为战争使诗人更深切地意识到个人的生命与时代的境遇、家国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冯至为代表的40年代现代主义诗人，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将个人经验融入到民族历史经验中，创造出“现实、象征、玄学”高度融合的诗歌境界。穆旦曾说：“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⑦40年代的诗人常常以山水自然意象书写他们“发现底惊异”。如冯至从一棵树身上感受到一个圣者的灵魂；杜运燮则说：“今夜我忽然发现/树有另一种美丽”^⑧；而艾青从表面“彼此孤立着”的树看到了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因

①冯至：《〈山水〉后记》，载《冯至全集》第3卷，第73页。

②里尔克：《论“山水”》，载《冯至全集》第11卷，第330页。

③段德智：《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④里尔克：《论“山水”》，载《冯至全集》第11卷，第330页。

⑤冯至：《〈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者序》，载《冯至全集》第11卷，第282~283页。

⑥解志熙：《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论冯至的创作与存在主义的关系》，载《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⑦穆旦：《致郭保卫的信之二（1975年9月6日）》，载《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第223页。

⑧杜运燮：《露营》，《诗四十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

为“在看不见的深处/他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①;郑敏则从树的姿态里看到了宁静与永恒。她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象我从树的姿态里/所感受到的那样深”^②。常人并不在意的一颗普通的树,诗人却敏感地发现了“另一种美丽”,而那正是战争环境里的一种坚韧的向上的力量,它维系着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的希望。与“树”相呼应的是“旗”、“旗手”、“先导”、“英雄”等意象,这些象征战争的符号频繁出现于40年代的诗中。如《十四行集》的结尾就聚焦于一面飘扬的旗帜:“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值得一提的是,诗人梁宗岱、卞之琳、冯至等都曾翻译过里尔克著名的散文诗《旗手》,它描写了旗手的爱与死之歌,战争、玫瑰花、母亲、乡愁等意象交织其中。冯至等诗人热情地译介它恐怕正在于它传达了在战争这样“严肃的时辰”人们所特别需要的一种“旗手”式的精神吧。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在1940年代战争的阴云密布下,冯至为何对日常生活有那么深厚的热情,对自然万物有那么深切的感念,因为这一切无不与他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他怀着深沉的敬仰抒写着“蔡元培”、“鲁迅”、“杜甫”,他又将真诚的赞美献给一个普通的战士、一棵树、一株草或一只小昆虫。“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他从那些或伟大或平凡的事物中,看到了个体生命的坚韧与自觉,看到了自我决断的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精神,而这或许正是一个处于危难中的民族最迫切需要的。因此,写作《十四行集》的冯至,并没有像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诗人那样急切地“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③,放逐了此前精致的个人抒情而融入到时代的大合唱中;也没有像穆旦、杜运燮等诗人那样在自我与时代、现实与玄学的挣扎中呈现出一种灵魂分裂的痛苦状态。相比较而言,冯至或许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即在关注现实苦难时并不放弃个性化的哲学沉思,在个性化的哲学沉思中又包含着现实苦难的关照,而这二者又被完美地融合到一种日常化的诗学境界中。战争与日常生活、战争与诗、战争与知识分子,这或许是生活在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的每一位诗人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吧。

●作者简介:汪云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上海 200240。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艾 青:《树》,《旷野》,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

②郑 敏:《树》,载《诗集:1942—1947》,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

③卞之琳:《给〈论持久战〉的著者》,载《卞之琳文集》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